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朱熹

周子同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熹 朱

著 同 子 周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百 科 小 築 書

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  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再版

著作周予同

印發行者兼  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 
商務印書館

上海及各埠  
上 海 河 南 路

熹 朱

究必印翻有權版

編主五雲王  
庫文有萬

種千一集一第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一千種

總編纂者  
王雲五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# 朱熹

## 目錄

### 第一章 引言——宋學之產生與完成

——中國學術思想之八大時期——宋學之前期與後期——宋學產生之積極的與消極的因素——消極的因素之一、訓詁學之反動——消極的因素之二、純文學之反動——積極的因素之一、佛教思想之影響——積極的因素之三、道家思想之影響——積極的因素之三、方士思想之影響——朱學之前驅者

### 第二章 朱熹傳略

### 第三章 朱熹之哲學

一 本體論——理氣二元論——理一氣殊說

二 價值論

倫理哲學——性論——心論——修養論——修養之目標——修養之方法

教育哲學——教育目的論——教育方法論——教育制度論——教育制度之攻擊——理想教育之二級制——書院教育之實施

政治哲學——唯心論

宗教哲學——泛神論——鬼神二元論——人鬼論——物魅論——祭祀觀

三 認識論——先知後行說——致知格物說——讀書窮理說

## 第四章 朱熹之經學 ······

——經學史之鳥瞰——經學與哲學之異同——

一 易經學——易經學之象數派與義理派——易經學之漢學與宋學——朱熹易經學之立場

二 書經學——書經之今文與古文——朱熹之僞孔懷疑論

三 詩經學——朱熹詩經學之著作——詩經學之今文與古文——朱熹詩經學之內容——一詩序之

反對——二訓詁之博採——三鄭衛之淫詩——後儒之譏評——朱熹叶韻說之謬誤

四 禮經學——禮經三書之歷史——朱熹對禮經三書之評價

五 春秋學——朱熹與春秋學——春秋學之變遷與朱熹之消極的意見

六 孝經學——孝經學之變遷——朱熹孝經學之內容——後儒之譏評

七 四書學——四書之歷史——朱熹四書學之梗概與批判

## 第五章 朱熹之史學與文學

七九

——朱熹史部三書之評價——朱熹文學之根本的觀念——朱熹之修辭的意見——朱熹文學作品之成敗

## 第六章 朱熹與當代學派

八五

——朱熹與張栻——朱熹與呂祖謙——朱陸哲學之異同——朱陸方法論之爭辨(鵝湖之會)——朱陸本體論之爭辨(無極之辯)——浙東學派之永康派與永嘉派——朱學與浙派之異同——朱學之勁敵葉適

## 第七章 朱熹之著作

九三

一 經部——易類——書類——詩類——禮類——孝經類——四書類——五經總義類——小學類

二 史部——編年類——傳記類——政書類——地志類

三 子部——儒家類——道家類——雜家類

四 集部——楚辭類——別集類——總集類——詩文評類

第八章 朱學之傳授

附錄 朱熹簡明年譜

一一四  
一一五

# 朱熹

## 第一章 引言

中國歷來之學術思想，約略言之，分爲八期：

- 第一，自上古至春秋老孔以前，曰思想胚胎時期；
- 第二，自春秋老孔以後至秦，曰諸子爭鳴時期；
- 第三，兩漢自爲一期，曰儒學獨尊時期；
- 第四，魏晉自爲一期，曰道家復興時期；
- 第五，自南北朝至隋唐，曰佛教輸入時期；
- 第六，自宋迄明，曰儒佛混合時期；

第七，滿清一代，曰古學復興時期；

第八，自清末迄今，曰西學東漸時期。

其間時期之遞嬗，固不能有明確之分劃；蓋每一時期，常含有過去時期之餘波與未來時期之萌孽；然就學術思想之遷異及其要點而言，則析爲上述之八時期，亦未始非研究之一助也。

第六時期，儒佛混合時期，顯然又可劃分爲前後兩期；前期之唯一代表人物爲朱熹，而後期之唯一代表人物爲王守仁（陽明）。倘吾人爲便於記憶計，稱前期爲朱學時期，後期爲王學時期，亦決非絕對的誤謬。至普通名第六時期之學術爲宋學者，則以其與清代考證學之漢學對待而言；名爲理學者，則以其所討究之對象爲理氣等玄學問題而言，蓋皆僅爲稱謂之便，非確切之名詞也。

朱熹在中國哲學史與中國經濟史上，固自有其特殊之貢獻；然朱熹之學術思想，不產生於其他時期，而必產生於第六時期之前期，則不無時代的背景在；換言之，即完全受時代思潮之影響。故吾人如欲論述朱熹，須先論述其時代思潮發生之因素。

吾人稱第六時期爲儒佛混合時期，實亦不過就此時期之顯著特點而言，絕未能將其時代思

潮發生之因素盡行包舉也。蓋此時期雖以春秋以來之儒學與印度輸入之佛學二者爲其骨幹，爲其中心；然非除儒佛二種思想外，絕無其他思想之參雜；不過以此二種思想爲其最重要之因素而已。故詳確論之，第六時期學術思想產生之原因，可分爲消極的與積極的。消極方面又可析爲二：一爲訓詁學之反動，二爲純文學之反動。積極方面又可析爲三：一爲佛教思想之影響，二爲道家思想之影響，三爲方士思想之影響。茲分述之。

儒家之開山祖爲孔丘，其繼承之大師爲孟軻與荀況；其學之真象，雖因後代羣言淆亂之故，迄今未得其究竟；但吾人一讀論語、孟子、荀子諸書，則儒家之非拘於訓詁文字之末，而欲以其道拯救當時及後世之人羣，則顯然可知。不料漢代尊孔之後，所謂孔教，所謂儒學之研究者，僅僅留意於殘缺雜湊之五經。自司馬遷史記列經生爲儒林，於是章句迂儒與援經希寵之徒，漫然以承孟荀之道統自詡。古所謂微言絕，大義乖，實自漢初經生始也。自儒學移爲經學，於是訓詁之學與思辨之途塞。漢武以降，如今文、古文之爭論，如鄭玄、王肅之排詆，如南學、北學之分歧，如孔穎達、賈公彥之義疏，雖繁簡華實迥然各異；然其埋頭於文字典章之解釋與爭辯，則絕無二致。當時竟有『寧道孔孟誤，諱

言鄭服非」之諺，則訓詁學末流之弊昭然若揭。至宋代，承隋唐義疏派之後，學者研究之封域愈隘；欲自逞才識，於勢不能不別求途徑。故宋代學者，傑傲者有『六經皆我註脚』之語，而中庸者亦不憚以臆見解經而出於刪改。宋代經學之衰落在此，宋代哲學之勃興亦在此。總之，訓詁學之反動，實宋學產生之消極的有力的因素也。

吾人以純文學之反動爲宋學產生之消極的因素之一，或啓人以疑問：以爲宋詞與宋詩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優越地位，而散文如歐、曾、蘇、王輩，世亦每與唐之韓、柳並論；純文學之在趙宋似不能斥爲衰歇。按此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之論也。蓋宋承唐代文學極盛之後，學人士子歧爲文哲二途。耽文學者，雖思紹盛唐之餘音，而其技巧已別出於高抗瘦爽一途；觀宋詩之命意鍊句，每多山林隱逸之氣，與唐詩之專事繁縟者迥殊，可爲一證。至治玄學者，則固執文以載道之見，卑視唐儒思想之浮薄，而直以文學爲玩物喪志。宋學之產生，此種文藝排斥論實含有一部分之力量。蓋唐之學者每欲萃文學哲學於一身，韓愈原道一文，即係顯據；宋代則文哲分途，觀當時語錄體之發生與盛行，則哲人之蔑視文藝可知。周敦頤曰：『文辭，藝也；道德，實也。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，藝焉

而已。」程顥曰：「學本是修德，有德然後有言，退之卻倒學了。」程頤曰：「凡爲文，不專意則不工；若專意則志局於此，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？書曰：『玩物喪志，』爲文亦玩物也。」又曰：「今爲文者，專務章句，悅人耳目；既務悅人，非俳優而何？」觀諸儒之論，則宋學之產生，原於純文學之反動，非妄言矣。

佛學之影響於宋學，其時最久，而其力亦最偉。吾人如謂無佛學即無宋學，決非虛誕之論。宋學之所號召者曰儒學，而其所以號召者實爲佛學；要言之，宋學者，儒表佛裏之學而已。蓋原始之儒家，留意於修齊治平之道，疲精於禮樂刑政之術；雖間有仁義中和之談，要不越日常道德之際。及至宋代之理學，始進而討究原理，求垂教之本原於心性，求心性之本原於宇宙。故儒家之特色爲實踐的、情意的、社會的、倫理的；而理學之特色則爲玄想的、理智的、個人的、哲學的；二者殊不相同。至理學之所以異於儒家者，則完全受佛學之激刺與影響。蓋佛學玄妙之說，本非儒家所企及；後儒欲以儒抗佛，不能不於本體論或形而上學有所說明；而欲有所說明，則又不能不借助於佛學。故宋明理學之徒，或僅因佛而釋儒，或直援佛以入儒；其對於佛學之取舍與多寡雖不甚同，而其受佛學之激刺與

影響則初無二致。考儒佛混合之迹，實非始於宋代。自晉世羅什廣譯經典，慧遠創始蓮社，儒釋已有混合之機。當時如范寧深於春秋，從受法華；雷次宗通毛詩、三禮，自名居士。其餘南北史儒林傳中，如何胤、張璣之徒，亦多通內典。唐世佛學益盛，名僧輩出。韓愈昌言排佛，而善大顛；其友柳宗元爲慧能作碑誌，其徒李翹亦與惟儼、大義交好，卽當時所作之原道，亦不過虛張聲勢而已。其時圭峯禪師宗密著原人論及圓覺經略疏；原人論以儒老歸攝佛教，圓覺疏以易乾卦說佛心；蓋治佛學者亦頗援引儒書矣。及至宋代，禪宗獨盛，臨濟、鴻仰、雲門、法眼、曹洞、楊岐、黃龍，五家七宗，枝分派別。當時如周敦頤之學，據居士分燈錄，謂啓迪於慧南，發明於佛印，廓達於常總。其餘如程頤之於靈源，游酢之於道寧，楊時之於常總，陳瓘之於明智，胡安國之於祖秀，朱熹之於道謙，皆有相當之關係。雖禪家記載，不無附益過甚之辭；然理學之徒與高僧往還議論，則宜可信焉。（日本忽滑谷快天曾著禪學思想史，述宋代儒禪之關係頗詳，可參考。）明乎此，則宋學之產生，實以佛學爲其重要之因素也。

儒家思想之特色爲實踐，而其態度爲妥協，故僅足以範篤實忠信之士，而不足以饒聰慧超越之徒。况經兩漢經學鼎盛之餘，儒者以抱殘守闕爲能事，益無思想可言。魏晉之際，天才輩出，勢之所

趨不得不援道以入儒。王弼注周易，盡掃象數占驗；何晏解論語，而以清談馳譽；皆其顯證。其後雖因佛教東來，而起三教調和之論；然孫綽、張融、周顥、顧歡之徒，究其有得於釋氏者淺，而浸潤於儒道者深。及至宋代，理學之徒，日思建設儒家之本體論或宇宙觀，以與佛抗，於是著意於易象，而易與道通，由來已久。於是又有意無意之間，潛受老莊學說之影響。最著者，如程顥之論定性，謂『天地之常心，普萬物而無心；聖人之常情，順萬事而無情。』又謂『君子之學，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。』又謂『與其非外而是內，不若內外之兩忘。』其發揮自然哲學之極致，幾與道家有玉楮亂真之概。（章炳麟檢論卷四通程篇，亦言大程遠於釋氏，而偏邇老聃。）他如濂溪之言無極，伊川之撰易傳，均不能謂其毫無老莊思想之因素。故宋初之道學，與周末之道家，究其微言，固非若秦越之相距也。

方士之術，肇於古之陰陽家言。炎漢之際，經生迂儒，希祿取寵，援引以飾經術。大儒如董仲舒、劉向輩，亦不惜言黃金可成，不死之藥可致。其後雖屢經變遷，然仍潛伏於民間。迨張角之徒興，而道教之名以起。魏晉之間，道教妖妄之談，雖不見信於哲人，而方士服食求仙之術，尚盛行於當時。（魯迅曾著有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，見北新雜誌第二卷第二號，頗饒趣味，可參看。）抱

朴子一書，以儒論爲外篇，以道術爲內篇，實可代表當時一部分之思想。降及趙宋，陳搏以一道士，承魏伯陽參同契之妄說，居然作宋代哲學及易經學之開創者。即北宋五子中之周敦頤與邵雍，其思想與風度，亦在儒家與方士之間。朱熹以正統儼然自居者，然撰著陰符經考異及周易參同契考異二書，並自署爲空同道士鄒訢。（鄒本邾國，其後去邑而爲朱，故以寓姓。禮記鄭氏註，訢當作熹；又集韻，熹訢均虛其切，故以寓名。）或者謂朱子遭逢世難，不得已而託諸神仙，殆與韓愈謫潮州邀大顛同遊之意相類，以爲朱子出脫然無論如何，當時學者之受方士思想之影響，實由此而益可明證也。

宋代學術思想之產生，既自有其消極的與積極的之因素；則朱熹學術思想之所以爲『朱熹』的，亦自可瞭然。但一切學術思想之產生與完成，自有其相當之步驟；朱熹之學術思想既可稱爲第六時期前期之集大成者，則必有其前驅者。在朱熹學術思想之前驅者，簡言之，可分爲二期：第一期可以胡瑗、孫復爲代表，第二期可以周敦頤、邵雍、張載、程顥、程頤五子爲代表。蓋宋代哲學之產生，實始於疑經，疑經之極，於是自抒其心得而形成一種哲學。王應麟因學紀聞云：『自漢儒至於慶歷間，談經者守故訓而不鑿；七經小傳（劉敞）出，而稍尚新奇矣；至三經義（王安石）行，視漢儒之

學若土梗。」司馬光論風俗劄子亦云：「新進後生，口傳耳剽，讀易未識卦爻，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；讀禮未知篇數，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；讀詩未盡周南、召南，已謂毛鄭爲章句之學；讀春秋未知十二公，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。」則當時懷疑經傳之風之盛，概可想見。而胡瑗孫復於疑經之外，且復兼及玄學。（復撰春秋尊王發微，瑗撰洪範口義，皆自抒心得。）更因聚徒講授之故，學風之傳播益速。全祖望謂：「宋世學術之盛，安定（瑗）泰山（復）爲之先河。安定沈潛，泰山高明；安定篤實，泰山剛健；各得其性稟之所近，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。」（見宋元學案序錄）可謂知言。總之，胡瑗、孫復實形成宋學之雛型，而爲朱學第一期之前驅者。及周、邵、張、程相繼崛起，深涉哲學之淵，而宋學益燦爛可觀。然五子天稟有慧鈍，涵養有深淺，故其所蓄之思想與所發之言論亦各不同。在北宋時，哲學界僅有近似之風氣，而無統一之局勢；以二程手足之親，而見解亦復各異，可窺一斑。及朱熹出，始憑籍五子之所得，而自以其學爲去取。雖鵝湖之會，不見信於象山（陸九淵），心性之談，復被詆於浙東（如陳亮、陳傅良、葉適），然在當時，實自有其權威。故北宋五子又可謂朱學第二期之前驅者。

吾人既了解宋學產生之因素，復曉悟朱學前驅者之情況，始可進述朱熹之生平及其學術思